

SHEHUI "ZISHENG ZHIXU" DE ZHONGGUO JINGJISHI JINGXIANG
HUABEI MIANBU SHICHANG BIAN DONG YUANYIN YANJIU(1867-1937)

社会“自生秩序”的中国经济史镜像

谢亮 著

华北棉布市场变动原因研究(1867 - 1937)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社会“自生秩序”的中国经济史镜像

——华北棉布市场变动原因研究(1867—1937)

谢 亮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上海·西安·北京·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自生秩序”的中国经济史镜像：华北棉布市场变动原因研究：1867～1937 / 谢亮著. —上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2. 3

ISBN 978-7-5100-4399-4

I. ①社… II. ①谢… III. ①棉布-商业史-研究-华北地区-1867～1937 IV. ①F724.7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35427 号

社会“自生秩序”的中国经济史镜像

华北棉布市场变动原因研究(1867—1937)

谢 亮 著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市广中路 88 号

邮政编码 200083

上海市印刷七厂有限公司印刷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质检科电话: 021-59110729)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8.25 字数: 430 000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00-4399-4/G·310

定价: 48.00 元

<http://www.wpcsh.com.cn>

<http://www.wpcsh.com>

序

自20世纪80年代文化研究兴盛以来,衣、食、住、行的变化就是其研究的重要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研究也应该步步深入,但既有的研究并没做到这一点,甚至进入21世纪以后,一些人在讨论近代文化现象时,仍满足于对国人的衣、食、住、行作笼统的概述,不免让人失望。如何将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洋布”(机织布)在近代中国不仅关乎国计民生,而且是一种颇为特殊的物质文化,其本身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因此,谢亮在选题时,我建议他以“洋布”为研究对象,从概念入手,对近代以来“洋布”的输入、生产、销售和消费进行系统考察,并进而探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与规律,争取将观念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一气打通。

在研究过程中,谢亮的研究重心多少有些变化,他没有去纠缠“洋布”的概念、生产与消费,而是将着力点放在了近代华北棉布市场变动原因的分析上,并由此去审视社会变迁中的“自生秩序”与“外在变量”的关系。他还将哈耶克意义上的“自生秩序”思想作为方法论引入了本研究。风险固然难免,但这种尝试无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社会“自生秩序”的中国经济史镜像——华北棉布市场变动原因研究(1867—1937)》一书就是他的研究成果。他认为: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作为规则性的新秩序是一种普遍联系的结构,它由“制度和惯例构成,是人的活动之结果而非人的明确意图之产物”。这一看法与过往的研究有很大不同。因为后者常常强调,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新秩序的形成更多呈现了“明确意图设计”的特征。他对这一观点能否确立起来颇为担心,我对此却比较释然。一种学术观点,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不妨作为一家之说存在。即使不被认同,至少亦可令人去思考。

柯林伍德说过:“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句话的前提是:“历史的过程不

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而历史学家所要寻求的正是这些思想过程。”(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02—303页)就字面看来,“自生秩序”理论与柯林伍德的观点似有不同。究竟孰是孰非?大凡经过2003年“非典”的人,都对当时该病毒的肆虐印象深刻,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在这种非常状态下中国乡村社会自生出来的种种社会秩序及其价值。我认为,要从发生学的角度探讨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非典”状态下中国乡村社会的种种自生秩序具有标本意义。与此相类似的,还有西周初年被分封到黄河中下游和长江流域的“诸夏”,以及近代以来海外华人群体,虽然他们的生存样态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宗主国传统和当地地理环境的影响,但其最终形成这样而非那样的本质性特征,自生性恐怕是不容忽视的内容。因此,如果要研究一种文明的发生,探讨的重点与其说是某种“思想过程”,毋宁说是该文明的自生秩序形成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因经济史研究非我所长,本研究主要靠谢亮自己来完成,我能提的建设性意见少之又少。谢亮本科时学的是英语,硕士阶段才接触中国近现代史。不过,他学术研究志向甚高,平时非常努力,进入研究状态也比较快。我对此颇感欣慰!在我看来,不论做事治学,凡事缩手缩脚,很难想象将来会有大的成就。因此我总是要求我的学生:学术志向要高,但着手具体问题研究时身段要低。希望谢亮以后在这方面用心体悟。

前几天谢亮来信索序,因是其第一本学术著作出版,作为老师,自然乐意为之。聊作数语,以应其请。

是为序。

郭双林

2011年11月6日

自序：“自生秩序”之于中国问题研究

“自生秩序”无论是作为思想观念或知识话语，还是作为体现特定思维方式的生活智慧，它在中国人之生命历程中本可谓根源有据而又生生不息。

但是，根因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变革环境及受因之而继的思维方式或观念的影响，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能否独立于“外在变量”而生成“自生秩序”却成了需重新审视的重大命题。而学界于近现代中国问题研究的惯常采行的范式——“结构功能主义”、“革命”话语、“冲击与反应”、“近代化选择”，甚或所谓“中国中心观”，乃至“传统创造性转化”——于此现象也作了具体呈现。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这些范式内在的“秩序建构”特质与人类形形色色的“建构理性主义”的特征若合符节。它们内含反传统主义的、唯理主义的认识论缺陷，并基于本质主义的立场，以对历史的非客观和非“在场”式的理解遮蔽了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因为，它们对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解释及其理想图景的建构——无论是具体性阐释“宪政的民族国家”、“科学”、“市场经济”等话语谱系，还是基于特定意识形态而在宏大目标层面将其与“主义”相关联——都是以“外部世界”之理想参照而成一种理想之证明和设计。这恰如哈耶克对建构理性主义者的批评所强调的那样，“他们以为文明的好处皆来自人类有意识地迈向预先设计好的目标，而不是来自秩序之自发形成过程。”（Norman. Barry (University of Buckingham.) *The Tradition of Spontaneous Order, Literature of Liberty*, vol. v, no. 2, Summer 1982, pp. 7-58. 另见秋风译《自生自发秩序的传统》）

于此，学界对近现代中国商品市场变动原因、市场发展模式演变、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等命题的讨论亦不幸地被淹没于前述范式的思维逻辑中。而且，前述范式更否定“自生秩序”对资源配置、法律、观念、习俗等界限的跨越。

所以，基于经验主义的立场和对既有研究范式的反动，我试图通过探究1867—1937年间华北棉布市场变动原因，以思考市场变动乃至近现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

“自生秩序”命题。而且,这样的研究意在凸显我之下述判断当可成立。即:

近现代中国社会呈现的不中不西、古今皆存、多元共生之历史镜像,凸显了其独特生存环境中的各种“秩序建构”主张及其实践常伴生的某种“不确定性”。此事实反衬出其社会变迁中客观存在的“自生秩序”现象。它之学理意义在于揭示:东西亦或古今,“自生秩序”皆是人们在各自独特生存境遇中,探索出来的用以应付无所不在的“无知”和“不确定性”的客观事实的机制。“自生秩序”既是思观念、知识话语,又是体现特定思维方式的生活智慧。由此,讨论一区域、一社会、一民族、一国家之历史主体性或连续性,我们既不必基于强调其特殊性而忽视诸如“近代”之类外在变量的影响——如超稳定论,深层文化内核论,亦无需为凸显“外在变量”之作用而按其样态书写自身历史发展轨迹——如一味凸显近现代中国基于花样繁多的“近代”观念暗示而“求新”、“求变”、“遵古”、“反古”。或许呈现“外在变量”与某种“自然状态”如何融生为一“自生秩序”才最为紧要。

事实上,华北棉布市场变动中呈现的两种意义上的自生市场秩序,亦确为反驳前述范式提供切实的支持。在“约定的”(conventional)、“自然的”的意义上,基于经验主义的立场而论,并以外在近代化因素的强制嵌入为界分,这两种秩序即是“不受强制形成的型式”、“适者生存”的市场秩序。前者意指华北棉布市场未被裹挟进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之前,从其市场主体基本不受国际市场影响的且能自我循环的市场行为中形成的总体制度结构。“适者生存”则意味着自此之后,此总体制度结构——如其法律和市场管理制度——若不经历“近代化”的转换过程就不能自存,更遑论其生长。从秩序生成之过程来看,二者都表明,根源于相应社会结构的市场秩序并非都是出自人的有意识设计。但前者更能说明市场自身的制度和惯例是如何以一种因果一起源学的方式形成,而后者则描述市场的此类制度和惯例在与“近代”因素的竞争中如何生存发展。同时,两种意义上的自生秩序表明,特定外在变量——如“近代”观念——若不与人们生活状态的自然演进相关联,却依此而进行制度设计以图规范和建构一种秩序就必是唯理主义的思维方式。

当然,此种论断的潜在的危险客观存在。因为,“自生秩序”与“自然秩序”之边界何在?两种秩序下的制度设计、选择及秩序演进中的“新”、“旧”当何论?更何况“新旧”、“古今”之时间特质的哲学争论原本就大。前引方法论能面对这类追问吗?我学力不足凸显的不精致论证亦更加剧此困惑。但我更强调,无论是将“自生秩序”思想作为方法论引入亦或是作为问题意识呈现,它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都是有意义的。

如今,小书即成,却多有遗憾,为尽量弥补缺陷,就啰唆前言以为自序。

目 录

序	I
自序：“自生秩序”之于中国问题研究	III
1 绪论：“棉布研究”的论争	1
1.1 问题的缘起	1
1.2 学术史回顾——对“棉布研究”的再批判	3
1.2.1 纳入市场史视野研究的商品棉布	3
1.2.2 手工业史、商业史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视野下的棉布研究	5
1.2.3 思想文化史视野下的棉布及其市场研究	7
1.3 对“华北”的界定及相关说明	8
1.3.1 华北的界定	8
1.3.2 何以选择华北	8
1.3.3 研究时段的上下限	9
1.3.4 本文的主要数据(文献)资料	10
1.4 本书的分析思路及框架结构	10
1.4.1 本书的核心概念	10
1.4.2 研究主旨说明	11
1.4.3 本文分析思路和研究内容	11
2 开埠通商、洋布输入与华北棉布市场变动加剧	12
2.1 开埠通商前的华北棉布市场	12
2.1.1 棉花种植面积扩大与家庭棉纺织业迅速发展	12
2.1.2 棉布商品率的提高与市场交易量扩大	13
2.1.3 华北棉布和江南土布在华北市场的竞争	15
2.1.4 开埠通商前华北棉布市场的评价及其变动因素的分析	19
2.2 开埠通商后的华北棉布市场变动	20
2.2.1 商品棉布生产的分化	20
2.2.2 市场商品结构的变化	28
2.2.3 市场体系的变迁	35

2.2.4	商品总量、流通量增加与市场波动较大	41
2.2.5	市场价格结构变动趋势	45
2.2.6	商品运输方式转变	49
2.2.7	棉布消费群体的分化	51
2.3	结语	55
3	近代华北棉布市场变动的内在因素	56
3.1	人口变迁与华北棉布市场变动	56
3.1.1	总人口数目巨大与市场总需求增加	56
3.1.2	人口迁徙与棉布市场需求增加	58
3.1.3	人口压力与商品化植棉业和手工棉布生产的发展	65
3.2	近代工矿业、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与华北棉布市场结构变动	71
3.2.1	市场空间结构变化	71
3.2.2	近代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使城市在整个棉布市场中居关键地位	76
3.3	“粮棉”价格波动与棉布市场变动	78
3.3.1	近代华北市场以“粮棉”为核心的商品结构	78
3.3.2	“粮棉”商品的价格波动与棉布市场需求变动	82
3.3.3	“棉”价升降受“粮”价变动影响	83
3.4	“银根松紧”与华北棉布市场的变动	84
3.4.1	“银根松紧”对市场商品价格变动的影响	85
3.4.2	棉布市场“银根松紧”变化的主要原因	89
3.4.3	“银根松紧”与华北棉布市场变动	94
3.5	战争灾荒与华北棉布市场变动	109
3.6	结语	112
4	厂商经营行为变化与棉布市场变动	113
4.1	华北市场上的棉布厂商	113
4.1.1	华北市场上棉布厂商的构成	113
4.2	棉布厂商的资本类型及其经营制度演变	125
4.2.1	布商资本类型演变	125
4.2.2	棉布生产厂商资本类型演变	129
4.2.3	资本构成变化与厂商经营制度嬗变	131
4.3	布商经营行为嬗变与棉布市场变动	145
4.3.1	布商大量采购并推销洋布	145
4.3.2	布商与棉布市场的拓展	147
4.3.3	本土布商营销理念演变与市场变动	153
4.3.4	布商劣行与棉布市场变动	158
4.4	中外布商竞争、合作关系演变与华北棉布市场变动	160
4.4.1	洋商间市场竞争与华北棉布市场变动	160
4.4.2	中外商人间的市场竞争与合作	162

4.5	竞争视野下的 30 年代民族纺织业危机与棉布市场变动	174
4.6	抵货运动与华北棉布市场的变动——以抵制日货为侧重兼及棉纺织业危机	182
4.6.1	近代华北抵制外货运动的起因	183
4.6.2	抵货运动与华北棉布市场的变动	183
4.6.3	抵货运动与华北棉布市场变动的另类表现形式	185
4.6.4	抵货运动与华北棉布市场变动之关系再评价	187
4.7	结语	191
5	政府政策调整与华北棉布市场变动	192
5.1	开埠通商前华北棉布市场变动的制度环境分析	192
5.1.1	公共产品层面	192
5.1.2	具体实践层面	193
5.2	不平等条约与近代华北棉布市场制度体系剧变	196
5.2.1	不平等条约体系与传统市场的制度体系的结构性矛盾	196
5.2.2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结构性调整	197
5.3	政府政策调整与近代华北棉布市场制度体系之重建	203
5.3.1	设立新职能机构	203
5.3.2	重构市场的近代化法制体系	204
5.3.3	政府重建市场金融(货币)制度体系的努力	205
5.4	政府引导或推动棉布市场发展的相关政策	205
5.4.1	政府通过奖励政策引导棉纺织产业发展	205
5.4.2	通过税收减免促进国内棉织品的销售	206
5.4.3	政府拨官款兴办或资助棉布业	211
5.4.4	政府法规明确提倡服用国货、禁用洋货,直接干预棉布市场	218
5.4.5	政府推动棉花种植	219
5.5	政府政策调整与棉布市场变动之关系余论:以税收政策为中心	221
5.6	结束语	226
6	余论:多元变动因素与市场“自生秩序”	227
6.1	多元变动因素与市场发展模式转型	227
6.1.1	多元变动因素加速华北棉布市场发展模式转型	227
6.1.2	多元变动因素与华北棉布市场发展模式转型的困境	228
6.1.3	多元变动因素与传统社会经济结构自我调适的困境	230
6.2	市场变动中的“自生秩序”、“外在变量”	232
6.2.1	市场制度谱系“近代化”演进中的“理性”关涉	232
6.2.2	市场制度谱系“近代化”演进与华北棉布市场的“自生秩序”	233
6.2.3	宪政原则与市场发展模式转型可能的理想图系	235
6.3	结语	236
附录		238
参考文献		261
后记		275

图 表 目 录

表 2-1:开埠通商前后江南土布主要品种	15
表 2-2:江南主要市镇棉布生产和销售状况统计	16
表 2-3:开埠通商前后华北棉布主要名品统计	17
表 2-4:华北开埠通商前向商品化生产过渡的棉布产区	19
表 2-5:开埠通商前华北不产棉布地区统计	19
表 2-6:方志中,洋布输入后,手工棉布生产改良情况统计	22
表 2-7:洋布输入后,方志中棉布工场(工厂)经营情况统计	25
表 2-8:华北棉布(土布)的主要产地、品种统计	29
表 2-9:日本人统计华北市场主要洋纱、洋布品种	33
表 2-10:海关华北洋布进口种类统计	34
表 2-11:洋布输入前后华北手织布生产、销售状况变化统计(不包括在本境内销售)	35
表 2-12:华北各关直接进口来源地别棉布价值(1913—1935)	42
表 2-13:方志中华北地区土、洋布价格统计	45
表 2-14:天津海关常关货物运至内地之运输量统计	50
表 2-15:潍县土布通过胶济铁路外运量统计(1929—1935)	51
表 2-16:华北地方志中洋布输入后,棉布消费人群变化统计	51
表 3-1:近代华北城市人口资料略表	58
表 3-2:冀鲁豫农民离村去处所占百分比	59
表 3-3:天津工艺工人与裕元纱厂工人各类支出之分配	59
表 3-4:河北盐山县每作物亩与每“等全年人”收入比较表	60
表 3-5:1927—1930 年天津各类工人平均日实际工资(工资数额已按生活费指数折 成十五年之购买力)	60
表 3-6:裕元纱厂工人与天津工艺工人家庭收支之比较	61
表 3-7:1927 年天津劳动者每日工资表	61
表 3-8:1912—1937 年内地人口迁移东北三省之统计	62
表 3-9:河北完县家庭工业产品统计表中与棉纺织相关者(民国十九年建设局调查)	66

表3-10:河北南皮县工商制造产量及年值统计中与棉纺织相关者	66
表3-11:天津1891—1927年棉花流转数量各年平均数	68
表3-12:棉花、小麦每亩收支情况比较(山西临汾)	69
表3-13:华北七种农作物批发物价指数表(1913年=100)	69
表3-14:华北产棉县与产粮县土地使用情况	70
表3-15:天津、青岛华商纱厂纱锭在全国的比重统计(1890—1936)	77
表3-16:开埠通商前后华北集市商品交易物资统计	79
表3-17:华北部分县市粮棉商品市场价格变化统计	82
表3-18:清代银、钱比价	85
表3-19:银根松紧与津海关洋布交易变化情况统计	95
表3-20:1902、1903年津海关主要进口洋布、棉纱比较表	101
表3-21:津海关金银进出口贸易状况统计	102
表3-22:战争与灾荒与天津关进口棉布变动统计	109
表4-1:商人类型划分	114
表4-2:山西开办的工矿企业中与棉布业相关者	115
表4-3:北京织布工厂的设立情况表	116
表4-4:天津织布工厂的设立情况表	116
表4-5:竹竿巷四大著名棉布、棉纱店(号)	118
表4-6:竹竿巷其余二十四家纱布庄统计	119
表4-7:1931年天津纱厂统计	120
表4-8:河北成安县乡绅投资兴办织布厂统计	121
表4-9:河南武安县县外贸易一览表	124
表4-10:1932年高阳织布区手织户经营形式分类表	130
表4-11:瑞蚨祥本银账(民国二十九年清算民国二十八年大账)	132
表4-12:北平特别市工商业调查表	133
表4-13:瑞蚨祥的开交(支)、年纳捐税状况调查表	134
表4-14:高阳土布区包买商生产形式的发展(1912—1920)	135
表4-15:股份制公司与合伙制企业资本、设备、产能比较	140
表4-16:张北县大宗物质输入表中与棉布相关者	146
表4-17:潍县金融机关一览表	152
表4-18:1865年天津口岸与其他主要口岸进口棉布数量比	154
表4-19:大阪山东商人开设商号一览(截至1910年)	155
表4-20:河北良乡县全境商业调查表(有关棉布业部分)(1923年)	164
表4-21:河北完县城关上户统计	164
表4-22:1930年河北完县输出输入物资统计(土、洋布部分)(1930年建设局调查)	166
表4-23:列强在华棉纺织业的投资(与华北相关部分)(1890—1932)	167
表4-24:上海、青岛、天津日资纺织业比较(1925—1937)	167

表 4-25:天津纱厂调查	167
表 4-26:山东日商与华商纱厂增长指数	168
表 4-27:山东中日纱厂生产规模比较(1935)	168
表 4-28:山东中日纱厂棉纱产量比较(1930—1934)	169
表 4-29:青岛日本纺织业投资概况(1937)	174
表 4-30:1932 年高阳布匹销售区域分布情况统计	175
表 4-31:全国纱厂半年间停工锭数及全工开动率	178
表 4-32:三十年代危机期间各年下半年六个月的停工周期数与全工开动率	178
表 4-33:各籍纱厂外销棉纱平均支数	179
表 4-34:纱厂附设织厂外销棉布品质分配及各籍商所占之百分数	179
表 4-35:各籍纱厂机器设备之增加率	180
表 4-36:1931 年河北省的工农业输出入统计	181
表 4-37:全国纱厂纱布销量分国百分比	181
表 4-38:各籍纱厂外销棉纱平均支数	182
表 4-39:全国各籍纱厂外销棉纱支数分配百分比	182
表 5-1:1843 年协定关税前后主要进口货物新旧税率水准	196
表 5-2:1868 年进口本色市布在通商口岸和内地市场价格对比	196
表 5-3:各类棉布历年平均进口税率	209
表 5-4:周学熙用官款经营事业中与棉纺织相关者	211
表 5-5:周学熙以官款援助的民营企业中与棉纺织业相关者	211
表 5-6:1904—1910 年直隶各属传习工场概况(地方工艺局中与棉纺织业相关且 艺徒在 10 人及以上者)	212
表 5-7:近代华北主要棉产区棉花种植面积、产量及产额统计(1914—1937)	220
表 5-8:河南卫辉华新厂 1922—1936 年资本纯益率统计%	221
表 5-9:道光年间济南府属 16 州县商税统计	222
表 5-10:河北、山东地租形式数据	223
表 5-11:裁厘统税后棉纱税率变动统计	225
图 2-1:1863—1910 年天津、烟台口岸粗斜纹布进口数量变动趋势比较	43
图 2-2:1863—1910 年天津、烟台口岸印花布进口数量变动趋势比较	43
图 2-3:1863—1910 年天津、烟台口岸标布进口数量变动趋势比较	43
图 2-4:1863—1910 年天津、烟台口岸细斜纹布进口数量变动趋势比较	44
图 2-5:1899—1919 年胶州关本色粗细布、粗斜纹布、细斜纹布、标布、印花布进口数 量变动趋势比较	44
图 2-6:1863—1896 年天津口岸素羽绫、哔叽、毛织羽纱(camlet)、小呢进口数量变 动趋势比较	44
图 2-7:1921—1931 年进口本色市布全国平均价格、天津关进口价格、胶州关进口价 格变动趋势比较分析	46

图 2-8:1921—1931 年天津海关土布进口价格变动趋势	47
图 2-9:1921—1931 年进口棉纱全国平均价格、天津关价格、胶州关价格变动趋势比较分析	47
图 2-10:1921—1931 年进口染色粗布全国平均价格、天津关进口价格、胶州关进口价格变动趋势比较	47
图 2-11:1921—1931 年进口漂白市布全国平均价格、天津关进口价格、胶州关进口价格变动趋势	48
图 2-12:1921—1931 年进口漂白洋标布全国平均价格、天津关价格、胶州关价格变动趋势比较	48
图 2-13:1921—1931 年间进口漂白或染色洋纱(布)全国平均价格、天津关进口价格、胶州关进口价格变动趋势比较	48
图 2-14:1921—1931 年进口印花布全国平均价格、天津关进口价格、胶州关进口价格变动趋势比较	49
图 3-1:1913—1937 年天津批发物价指数食品类、纺织品类及物价总指数变动趋势比较分析	83
图 3-2:1913—1936 年天津批发物价指数农产品类、制造品类及物价总指数变动趋势比较分析	84
图 3-3:1800—1836 年北直隶宁津县乡镇的零售物价指数变动趋势	85
图 3-4:1888—1931 年中国银购买力汇价变动趋势	86
图 3-5:1867—1931 年中国、美国、英国金购买力指数变动趋势分析	86
图 3-6:1867—1931 年中国、美国、英国银购买力指数变动趋势比较分析	87
图 3-7:1867—1931 年中国、英国、美国银价指数变动趋势分析	87
图 3-8:1867—1931 年伦敦标准银价指数、纽约银价指数与中国进出口物价指数变动趋势分析	87
图 3-9:1867—1931 年中国银价指数、进出口物价指数、金购买力指数、银购买力指数变动趋势比较分析	88
图 3-10:1867—1931 年伦敦批发物价指数、纽约批发物价指数、中国进出口物价指数变动趋势比较分析	88
图 4-1:华北各关进口棉布变动趋势比较分析	161
图 4-2:华北各关进口英美棉布变动趋势比较分析	162
图 4-3:棉布市场的流转环节	163
图 4-4:1913—1931 年华北市场与全国市场直接进口洋纱数量之增减百分率变动趋势比较分析	169
图 4-5:1913—1931 年华北市场与全国市场进口棉布增减百分率变动趋势比较	170
图 4-6:1897—1936 年在华中外纱厂纱锭(%)变动趋势比较	170
图 4-7:1897—1936 年在华中外纱厂布机(%)变动趋势比较	171

图 4-8:1922—1936 年中国纱厂资本纯益率变动趋势比较分析	171
图 4-9:1922—1936 年华新集团纱厂资本纯益率与全国纱厂平均资本纯益率变动 趋势比较分析	172
图 4-10:1922—1936 年华北市场口岸地区纱厂与内地纱厂资本纯益率变动趋势比 较分析	172
图 4-11:甲午战争前中国进口棉布价格变动趋势	173
图 4-12:1921—1931 年进口印花市布价格变动趋势	173
图 4-13:1932—1937 年中国进口印花市布价格变动趋势	173

1 绪论：“棉布研究”的论争

1.1 问题的缘起

商品市场变动是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之重要课题。其中,开埠通商后,包括华北在内的棉布市场的剧烈变动及棉纺织业发展呈现的中国资本主义“既发展又不发展”的历史镜像,^①常迫使学人探究此中缘由何在?

学界于此问题之论争激烈。^②较主流者:①于棉布之市场销售状况变化,强调洋布的大规模销售,最终挤占了土布市场份额,居压倒性优势地位。在地域上,它经历了从沿海到内地、从口岸到城市、乡村之变化过程。其消费群体则由官员、商人、学生扩展到农民群体。②在产业发展方面,则强调洋布洋纱市场份额的扩大,促进了近代机器纺织产业的发展,但加剧了小农经济的解体。其扩展程序亦是由沿海到内地,由口岸到城市、乡村。③在市场竞争中,家庭手织布表现出了惊人的竞争力,民族纺织产业始终面临非平等性的市场竞争。④于棉布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政府几乎无所作为,或是想有所作为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加之,非平等性竞争普遍存在,使市场自主性发展严重缺失并致使其自身动力严重不足。就此而言,其市场的本质特征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具有内在关联性。华北棉布市场自然不例外于前述几种主要状况。

但前述研究结论未必能对应于华北棉布市场,存在显见缺陷。其根据在于:

① 见汪敬虞《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

② 按：开埠通商后，于包括华北棉布市场在内的中国棉布市场变动，国内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到19世纪末，洋纱、洋布等洋货已遍及中国穷乡僻壤，农民家庭手工业（主要是手工棉纺织业）因此尽遭破坏，农村自然经济也随之解体。”（见于素云《中国近代经济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5页。另外，此观点普遍见于以往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及教材中，其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20世纪80年代后，学界则有人断定，其时洋布输入仅限于通都大衢，无法深入农村内地。（见黄逸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学术月刊》1980年第8期，第16-22页。）此外，还有较多学者认为洋纱、洋布对长江中下游及东南、华南沿海地域的手工纺织业打击最大，此时还没有打入西南、西北及华北内地，那里的手工纺织业得以维持甚至有所发展。他们或认定在19世纪末洋纱、洋布并未进入华北内地，或坚持当地农村手工棉纺织业在此时并未遭到破坏。此类观点的代表当首推美国学者周锡瑞（Esherick W. Joseph）的调查研究，其后周对其观点做了些许调整。1986年冬实施的中日学者义和团联合调查后，有日本学者对上述调查进行了整理，其结论与周氏相近。（见周锡瑞《论义和团运动的社会成因》，《文史哲》1981年第1期，第22-31页。另见张思《遭遇与机遇：19世纪末中国农村手工业的曲折经历——以直鲁农村手工纺织业为例》，《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同期，美国学者费惟凯的有关断语则最为刺激。他认为，“整个手工业在1870—1911年期间并没有受到严重破坏”，并称以往中国学者的观点是“最粗浅的公式化的指责”。见费惟凯《1870—1911年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向》，节选自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页。Albert Feuerwerker, Handicraft and manufactured cotton textiles in China, 1871—191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0, 2, June, 1970, pp. 338—378.

第一,近代华北棉布市场变动是否仅可归因于洋布、洋纱的刺激?若非此,那么,其变动原因多元性又是什么?开埠通商后,华北社会自身的“人口变迁”、“近代工矿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以‘粮棉价格’为核心的工农产品价格变化”、“银根松紧”、“战争与灾荒”、“厂商经营行为的变化”、“政府调整经济政策”与其棉布市场变动的关系是什么?

第二,若上述问题值得讨论,鉴于土、洋布市场关系的变化,棉布市场变动本身又是如何促进或导致近代华北社会的内在变革,如在知识、制度、观念、社会习俗等方面?反之,此类变化对棉布市场变动又产生了何种影响?

第三,多元因素中是否又可分何者为主因,何者为次因?且,诸变动因素对近代华北棉布市场变动产生了何种积极影响或消极影响,或二者兼有之?诸因素是否使其市场变动呈现市场发展模式转型的特征?此种转型能否呈现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历史连续性?或者,此种转型的非顺利进行,是否预示其转型处于两难困境?若此,其原因又何在?

显然,前述研究于上述质疑无法一一对应。因为:前述研究在方法论上,隐含着“近(现)代化”范式和“冲击—反应”范式的双重理论预设。于此预设之下,其在理论上的潜在表达即是,从整体而言,中国自身旧有的经济发展方式——学界习惯性地将其称之为小农经济发展模式——不适应从扩大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竞争。其市场发展模式乃至中国社会,在以与现代农业品为核心要素的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必将经历“近(现)代”的这一同质化过程。由此,“近(现)代”这一标准,被学界建构成为审视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的市场发展模式,乃至其社会发展模式变动之外在维度,并逐渐内化为一些学人及部分民众的一种显见的文化心理。

但是,依此标准审视“中国问题”,其内含的“秩序建构”命题是否带有人类形形色色的“建构理性主义”(constructivistic rationalism)的些许特征呢?更关键者:前述诸变动因素是否都具有所谓的近(现)代特征?它们是否更因与中国社会关联而呈现一种历史连续性?并且,当外在因素成为商品市场发展模式的构成要素时,市场发展模式转型是否更因其对外部因素的技术性接纳,仍能呈现一种历史连续性呢?

此类追问凸显了一具有普遍意义的学理命题。即在近(现)代(化)语境中,人类形形色色的“建构理性主义”与一市场、一社会或一国家之“自生秩序”生成的是何关系呢?

若此,形形色色的“建构理性主义”对包括华北棉布市场在内的近现代乃至当下中国社会的自身知识体系的社会科学式的“改造”、“秩序建构”,就难免忽视其自身历史和现实经验曾经发展出的“自生秩序”逻辑。进而,与这一逻辑必然伴生的法律和社会制度、思想或观念、经济生活亦被基于社会科学立场的解读读者所忽视。事实上,仅仅基于解读资源配置的经济学原理,是完全不足以理解中国社会之经济秩序的生成。具体言之:对包括华北棉布市场在内的近代中国商品市场变动原因、商品经济发展或市场发展模式等命题的讨论亦不幸地被淹没于此种思维逻辑中。

同时,就一种思维方式而言,它们自动地否定了“自生秩序”思想对资源配置、法律、观念、习俗等界限的跨越。正因如此,在对近代华北棉布市场变动原因的研究中,我们应当强调,在“约定的”(conventional)和“自然的”的意义上,棉布市场变动中的某种规则性(regularities)或事态的秩序出现——如近代转型——既不纯粹是人为制度设计的产物(如华北棉布市场发展中的法制近代化命题),也不是纯粹的自然演进(如人口因素与华北棉布市场需求变化)。在近代华北棉布市场,作为社会规则性的新秩序的出现是“制度和惯例构